成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四期
2014 年 3 月　頁 43-80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杜甫病後的意義治療與自我實踐

何騏竹*

摘　要

本文以杜甫疾病書寫詩文為研究對象，主要考察其患病後，儒學所起的治療作用，從而引發的生命意義之追尋與超克。

杜甫向以儒者自居，自言「不敢忘本，不敢違仁」，從家庭傳統發悟自身的天命，中晚年病痛纏身，遭受巨大的身心磨難與生命困境，而其生命所浸染的儒家思想，如何幫助他超越生命的極限狀況，並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完成自我實踐。因此，本文首先依據杜甫生命歷程分為患病前、後兩個部分，首先，論述健康無病時的人生任務課題，其次，於患病後，疾病如何造成杜甫生存意義的困滯，杜甫又如何突破此種極限狀態，發揮出自由意志之精神力量，尋獲意義而產生自我實踐之新動能。

關鍵詞：杜甫、疾病書寫、意義治療、儒家型意義治療學

* 陸軍軍官學校通識中心副教授。

The Logo Therapy and Self-realization of Du Fu after Illness

Ho Chi-Chu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Military Academy

Abstract

This article took the ‘illness-poem’ written by Du Fu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e objective was to observe the use of Confucianism as the treatment method during his sickness and how he was awaken by the meaning of life to overcome his illness.

Du Fu treated himself as a Confucian, with a saying that he dared not forget his origin and disobey kindness. He realized his own life and mission through his family tradition. When he was in his late adulthood, he was suffered and distressed by illness, however, the Confucianism he had had helped him to overcome the life limitation and complete the self-realization between the ideal and reality. For this reason, this article separated Du Fu’s missions into two aspects: before and after his illness. First, we discussed his life responsibility when he was healthy. Next, we discussed how the disease has brought him the difficulty and constructed mental distress about his existence, still Du Fu managed to break through this limitation and bring the spiritual strength of the freedom of will. In conclusion, his momentum of life and self-realization was found.

Keywords: Du Fu, Writing of Illness, Logo Therapy, Therapy of Confucianism

杜甫病後的意義治療與自我實踐*

何騏竹

一、前言

「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的創始人是「第三維也納心理治療學派」傅朗克（Viktor E. Frankl），此派主要精神在於肯定人具有超越心理層面的「實存意義」的自由，常常在人類臨受苦難時產生。傅朗克於自傳《意義的呼喚‧意義療法的起步》中提到可以透過三種可能性來找尋生命的意義：創造的價值（creative values）／經驗的價值（experiential values）／態度的價值（attitudinal values），這三種可能性為「做一件事，成就一種創造」，其次為「一種經驗，亦即人的相會與相愛」，其三即為「面對無法改變的命運」。[1]傅朗克認為它們可以在苦難臨界的同一個時期產生，也可能在苦難的不同階段分別產生，而其中又有層次上的不同，「態度價值」高於「經驗價值」，又高於「創造價值」，因為「態度價值」所面對的是無法改變的命運，在有限的境遇中，方能體認到自我的獨特與唯一：

> 即使人在喪失了創造力與承受力的情況下，他仍然可以實現其生命中的一項意義。只有當人面臨這個命運，面對這種無助的情境時，他才有最後的機會來實現一項意義——即受難的意義。[2]

罹患疾病就是生死極限狀態，臨受了不可改變之命運，如此便能在受苦中體認到自

* 本論文初稿原宣讀於「第十屆生命實踐學術研討會」（臺北：華梵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1.11.19），此為修訂稿。承蒙會議評論人鄭幸雅教授精闢透徹的見解，以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之鼓勵與寶貴意見，對本論文及未來系列研究，皆深具啟發性，實感獲益良多，敬致謝忱。

1 〔奧〕維克多‧傅朗克（Viktor E. Frankl）著，鄭納無譯：《意義的呼喚》（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111。

2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黃宗仁譯：《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臺北：杏文出版社，1993），頁 15。

身的任務，產生一種「求意義的意志」（The will to meaning）[3]，並且積極的實踐它。

而傅朗克的「意義治療學」能環合融通中國傳統思想，引介、推進意義治療學之關鍵學者傅偉勳曾道：「中國思想所賦予終極意義的生死哲理，實可以用來深化傅朗克意義治療學的精神價值」[4]，傅偉勳認為「意義治療法」中「實存意義」可與儒學會通：

> 傅氏的意義意志類似孟子在人性的高層次肯定超越自然本能的本然善性，而他「人生乃是一種任務」的實存意義觀，亦會通著孔孟以來儒家所體認的正命或天命，亦即「人生是天賦善性所不得不弘顯的道德使命」。[5]

傅偉勳所引述的即是曾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6]，儒家將俗情世間的富貴得失個人命限視為「利」，而「能否完成個人生命歷程的道德使命，如貫徹天命，健行仁道、天道，死而後已」[7]，這是「義」，儒家天命的貫徹即是「內聖或外王之道（個體人格與政治社會的雙層圓善化）」。[8]

因此，若遇到不治之症等重大災難，儒家從不以身體疾病之治癒為目標，其治療不是「一種外力的加入」，而是「一種內力的迸發與昇進」[9]，符應儒家理想人格的展現；孔子說：「君子憂道不憂貧」[10]，道之行與不行才是儒者所關切的，而非個人出處得失疾病，因此，孔子亦曰：「朝聞道，夕死可矣」[11]，如果能體悟並實踐這份上天所賦予的道德使命，即使形軀轉瞬消亡，也不必掛懷。而傅朗克意義治療學之基本信條之一，即是：「人主要的關心並不在於獲得快樂或避免痛苦，而是要了解

---

3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黃宗仁譯：《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頁 5-7。

4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臺北：正中書局，2010），頁 220。

5 傅偉勳：《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 175。

6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泰伯〉，《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頁 71 下。

7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79。

8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頁 180。

9 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臺北：文海學術思想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1996），頁 119。

10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衛靈公〉，《論語注疏》，頁 141 上。

11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里仁〉，《論語注疏》，頁 37 上。

生命中的意義」，故不能以身體疾病治癒與否來評斷生命意義，應當使病人「發掘痛苦中的意義」[12]，在餘下短暫的生命中，勇於負責且承擔生命的探問。

因此，在肯定追求積極意義上，傅朗克「意義治療學」與「儒家意義治療學」可以融通，只是傅朗克的精神來源在於宗教，儒家是以「一體之仁」作為其心源動力[13]，因此，林安梧將儒家型的治療學稱為「儒家型意義治療學」，兩種治療學都充分肯定人生獨一無二的任務與責任。

再者，兩種治療學都強調極限狀況的意義。人生的重大遭遇，都被視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4]的一種試煉，從中發掘個人的使命感（天命），且能依此自強不息。故孔子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15]，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層是任何時刻都會持守擴充此天命，另一層意思是，在顛沛流離貧賤苦難中，更會促使強化道德覺醒的力量，誠如林安梧所云：「任何的悲苦與不順，會通過一個自覺過程，往上提昇而上遂於道，由這個道體再開啟一個生命的動力」。[16]

而杜甫多病與病後的療癒過程，剛好可突顯「儒家型意義治療學」的本色。秉此，我們來探勘深具儒者風範的杜甫，中晚年遭遇病苦之際，如何透過來自生命底層的憂患與關懷，將病苦涵融在怵惕惻隱之仁心中，開啟自我治療的動源。杜甫在病痛中挺出自我而深化其生命的意義，此可藉由傅朗克「意義治療學」之「尋找生命的意義」切入探討，而杜甫之抉擇與生命深層意義，又與其儒家思維息息相關，因此，本文須同時藉由「儒家意義治療學」進行探討。

其中有關杜甫疾病書寫與「儒家意義治療學」，前輩學者已奠定了豐富的研究成

12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趙可式、沈錦慧合譯：《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臺北：光啟文化事業出版社，1995），頁 139-140。

13 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頁 115。傅朗克之「意義治療學」肯定人有超越的靈性（spiritual），能在生命的極限狀況中呈顯出來，意識到自我生命終極意義而能超克痛苦。並以此治療精神官能症患者，引導他們體貼人類靈性層次中潛藏的意義。

14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告子下〉，《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頁 223 下。

15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里仁〉，《論語注疏》，頁 36 下。

16 林安梧：《新道家與治療學——老子的智慧》（臺北：臺灣商務出版社，2006），頁 41。

果[17]，本文立基於此，主要討論杜甫患病後，儒學所起的「意義治療」作用，而以此作為精神療癒力量，對治病痛的侵凌。是故，本文並非單純探討杜甫疾病，以及病痛所形成的生命觀照體悟，亦非考究杜甫之儒家思想，而是透過疾病以探究更高層次的精神世界，深掘病痛陰暗處之光明積極的自療意義。且特以疾病作為考驗，便是欲突顯自我治療之精髓，乃是病者（杜甫）親臨身疾苦痛，生命擠盪而出的回應態度，再者，病後自療亦是能真正證實杜甫自我開拓，履踐儒行之重要途徑。

而杜甫艱難苦痛的患病歷程，亦提供我們完整的研究文本。大抵於杜甫四十餘歲旅食京華時期，作品中已出現疾病抒懷的內容，如〈進封西嶽賦表〉:「況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而所懷冥寞，孤負皇恩」[18]，約於四十出頭時

17 本文旨在探討杜甫病後由其儒家思想背景所支承的生命意義，而引發的自療。由此衍伸與本文主題相關之研究範圍，主要有杜甫疾病書寫、杜甫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意義治療及意義治療學應用等三個層面，而各有其豐富之研究成果。有關杜甫疾病書寫主題之研究成果，如高旖璐〈杜甫詩中「齒」的意象書寫〉，大陸學者張英強〈杜甫健康悲劇探析〉，余厚洪〈試論杜甫疾病與杜詩風格形成之關係〉，馮麗霞〈白髮的憂傷——論杜甫詩歌中的白髮意象〉，鐘繼剛、姚小波〈杜甫草堂詩的衰病形象〉等，大多以杜甫因病而呈現之詩歌風格，或者詩歌中如何呈現杜甫之衰病形象為主之探討。而日人小高修司之系列論文，以其中醫專業，考論杜甫疾病，如〈杜甫疾病攷〉、〈杜甫と白居易の病態比較一特に白居易の服石の検証一〉（杜甫與白居易的病情比較——以白居易之服石（服用含礦物之藥品）為主體之探討）等。而以杜甫儒家思想為主軸的研究，如陳弱水〈思想史中的杜甫〉，趙海菱《杜甫與儒家文化傳統研究》，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第六章杜甫的詩歌：仁的境界〉，陶文鵬、趙見梅《論詩哲杜甫》，王貞《儒禪互補與杜甫的精神世界》等。其次，精於「儒家意義治療學」之研究與闡述之學者及其研究成果，如唐君毅《病裡乾坤》，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學問的生命與生命的學問》等，曾昭旭〈從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宗教的保合太合之道〉，蔡仁厚〈生命的提升與流通〉，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再論儒家型的意義治療學——以唐君毅先生的病裡乾坤為例〉等，鄭志明〈從唐君毅的《病裡乾坤》談儒學醫療〉、《從唐君毅《人生之體驗》談儒學的生命教育》、《生命關懷與心靈治療》等，袁保新〈人的存在問題〉，李瑞全〈儒家的生命倫理結構〉，傅佩榮〈儒家生死觀背後的信仰〉，段德智〈「不出而出」與「出而不出」〉，洪錦淳〈生死兩無憾——傳統儒家的臨終關懷〉，陳佳銘〈從孔、孟的命論談儒家意義治療學之建構〉等等，前輩學者對於傅朗克意義治療學與儒家意義治療學之融通與闡發，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尤在儒學協助人們反省生命存在的終極意義而引發、建立的治療學思維，給予筆者極大的啟發。另外有關意義治療法之應用，大多屬於哲學、宗教或心理學範疇，以其為方法論，運用於文學文本上較為少見，如吳幸姬〈從阮籍詠懷詩論文學與意義治療〉等。

18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進封西岳賦表〉，《杜詩詳注》（三）（臺北：里仁書局，1978），卷 24，頁 2158。推概本文寫作時間，《舊唐書・本紀第 9・玄宗下》載云：「天寶九載春正月……庚戌，群臣請封西嶽，從之」，然朱鶴齡注云寫作時間是：「年過四十，又云篤生司空，為十二載冬所上無疑」，按朱注，確已過天寶 9 年（750），然兩種說法相去不遠，可推測杜甫四十出頭歲數，已自言有病。

已自言有病。另有詩〈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也暗指身疾：「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19]清人浦起龍言此詩「殆由召試不遇，意將辭別而歸」[20]，其中有「故山多藥物，勝概憶桃源」，指洛陽故居有藥物可治，表達了避世回鄉的念想。而〈病後遇王倚飲贈歌〉中除了自陳長年多病外，也抒發了當時因夏天受到了暑邪，而秋日發病，染患瘧疾時，先發冷後發熱的痛苦：「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21]。另寫於天寶14年（755）之〈上韋左相二十韻〉：「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22]，以長卿與子夏之多病索居喻況，雖自陳多病，卻流露出急於求進，期待汲引之心。可見長安時期，杜甫詩中已語及多病，但病情不甚嚴重，如四十三歲所患之瘧疾，乃屬急症，通常不久便會痊癒。真正進入杜甫患病高峰期，應由慢性疾患來看。

廣德2年（764），杜甫年約五十二，有詩〈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23]《內經・痹論》：「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也」[24]，風寒濕和合侵入人體，致氣血經脈不順而閉阻，叫做痺證，「坐痺」應是下肢的麻痺。而「頭風」則是頭痛，因體虛而為風侵害所致，隋巢元方《諸病源侯論・頭面風候》：「頭面風者，是體虛諸陽經脈為風所乘也。諸陽經脈，上走受於頭面，運動勞役，陽氣發泄，腠理開而受風，謂之首風。病狀，頭面多汗，惡風，病甚則頭痛」。[25]以及頻繁於大歷2年（766）出現之耳聾病況敘述，如〈耳聾〉：「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26]，

參後晉・劉昫：《舊唐書・本紀第9・玄宗下》（臺北：鼎文書局，1994），卷9，頁224。

19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杜詩詳注》，卷2，頁132。

20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中華書局，1988），卷5之1，頁517。

21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病後遇王倚飲贈歌〉，《杜詩詳注》（一），卷3，頁198。

22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上韋左相二十韻〉，《杜詩詳注》（一），卷3，頁227。

23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杜詩詳注》（二），卷14，頁1179。

24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黃帝內經・素問卷 12・風論第 42・痺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73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138上。

25 隋・巢元方：《諸病源侯論・總論卷2・頭面風侯》，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734冊，頁563下-564上。

26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耳聾〉，《杜詩詳注》（三），卷20，頁1784。

〈獨坐〉:「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27]可見耳聾與眼疾都是他晚年的疾病。

而最為嚴重者，還是大歷元年（766），五十五歲始發之「消渴病」。以「消渴」二字來說，最早出現在〈別蔡十四著作〉:「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但更早是於廣德 2 年（764），年約五十三時所寫之〈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為我謝賈公，病肺臥江沱。」此「病肺」亦疑似消渴病，由其於大歷 2 年（766）所寫之〈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消渴已三年」，逆算三年，即是廣德 2 年，時間點上也較接近。而自廣德 2 年（764）後，杜甫疾病書寫多圍繞著肺病與消渴，而兩者推測應指同一疾病——消渴。

自東漢張仲景《金匱要略》初步提出消渴病變的臟器在肺、胃、腎，為後世奠定三消（上消、中消、下消）的雛形，且於〈肺痿肺癰咳嗽上氣〉載云:「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28]，而後隋代甄立言《古今驗錄》進一步提出三消病創論，分為消渴、消中、腎消，顯示消渴根據不同的臟器病變，而病狀殊異。至唐人王燾《外臺秘要方・肺痿方》也繼承了東漢以來對於肺臟致病機轉的認知：

> 《千金》論曰，寸口脈數，其人病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出，何也？師曰，此為肺痿之病。肺痿之病，何從得之？師曰：病熱在上焦，因欬為肺痿，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被駃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肺痿。[29]

因消渴而肺氣萎弱，當津液輸佈至肺時，肺氣功能不調，故不能下輸膀胱，因此多咳且有濁唾涎沫，〈又上後園山腳〉:「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30]，其中「戰」乃指劇咳而致身顫抖。因而，杜甫若以病位來說明病名，從「肺消」理解「消渴症」也是無可厚非。再者，消渴亦有「大渴引飲」的症狀，《釋名・釋疾病》釋「消渴」

---

27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獨坐〉,《杜詩詳注》(三)，卷 20，頁 1785。

28 漢・張機，清・徐彬註:《金匱要略論註・卷 7・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病脈症治第 7》，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4 冊，頁 60 下。

29 唐・王燾:《外臺祕要方・卷 10・肺痿方十一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6 冊，頁 327 下。

30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又上後園山腳〉,《杜詩詳注》(三)，卷 19，頁 1662。

曰：

消癉，癉，渴也。腎氣不周於胸胃中，津潤消渴，故欲得水也。[31]

「癉」於《原本廣韻》中謂：「內熱病也」[32]，消渴因內熱而津液竭少，故大渴引飲，而欲得水。杜甫亦有不少頻繁描寫口渴的詩，如：

〈示獠奴阿段〉：「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33]

〈同元使君春陵行〉：「我多長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才盡傷形骸，病渴汙官位。」[34]

〈過南嶽入洞庭湖〉：「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35]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裴虯）赴道州〉：「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36]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37]

追究起來，大渴引飲主要還是源自腎與胃的虛衰所引起的病變[38]，消渴病是系統性、整體性的疾病，一般而言，食物透過脾胃之吸收運化，輸佈至五臟六腑，脾胃居中，乃輸佈升降之樞紐，津液佈於腎，由腎統攝封藏、輸瀉、潤養，使人之精氣生生不息。若任一臟器損傷，亦將損害體內津液代謝的功能。而杜甫的胃功能不彰，也可

31 漢・劉熙：《釋名・卷 8・釋疾病第 26》，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頁 127。

32 清・不詳：《原本廣韻》，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24 冊，卷 2，頁 193。

33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示獠奴阿段〉，《杜詩詳注》（二），卷 15，頁 1271。

34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杜詩詳注》（三），卷 22，頁 1926。

35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過南嶽入洞庭湖〉，《杜詩詳注》（三），卷 22，頁 1951。

36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裴虯）赴道州〉，《杜詩詳注》（三），卷 22，頁 1991。

37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杜詩詳注》（三），卷 23，頁 2023。

38 從杜甫的各種狀態皆可推測其腎虛。如腎氣虛勞也會影響頭髮之白黑多寡，《素問・五藏生成論》：「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日人小高修司有兩篇論文談論杜甫的疾病：〈杜甫疾病攷〉與〈杜甫と白居易の病態比較－特に白居易の服石の検証－〉（以白居易之服石——服用含礦物之藥品為主體的探討），兩篇皆提到杜甫腎氣虛勞。前篇（〈杜甫疾病攷〉）表示杜甫先天腎精不足，乃源自母體。其母懷孕產下杜甫及其胞弟穎，造成腎氣不足而早逝。參〔日〕小高修司：〈杜甫疾病攷〉，《中唐文學會報》16（2009），頁 7。後篇載云：「杜甫在 56 歲後所罹患的「聾」、「落髮」、「白髮」皆與腎的狀態有關」。參〔日〕小高修司：〈杜甫と白居易の病態比較－特に白居易の服石の検証－〉，《白居易研究年報》11（2010），頁 259。

由杜詩中之「消中」探來，〈雨〉:「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屨」[39]，上消病位在肺，症狀乃渴而多飲，中消則病位在胃，《靈樞・師傳》載：「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40]，故中消欲多食卻形體消瘦。因此，杜甫由自身大渴引飲、咳嗽與消瘦的狀貌，以及腎、肺、胃臟器之虛勞，認定自己患得消渴，故於詩句中以「肺痿」、「肺枯」、「消中」等詞彙來呈現此病。

是而，由廣德 2 年（764）以至大歷年間（766-770），各種慢性病併發，杜甫面對無休止衰化，最終瀕死的自我，如何使受苦變得有意義，以啟發自我療癒的能量，才是真正的考驗。秉此，本文分為兩個部分討論，由於病後自我療癒的啟動，或源自病前之思想意識，因此，本文始由病前任務課題（人生價值使命）探討，由此延續至病後，亦可突顯患病前之價值取向與病後意義的轉變。故而，其一，考察杜甫患病之前，其人生之任務課題，亦即一己天命之所在，一生持守不悔之使命感。其二，患病後，隨著身體氣貌的改變，如何透過病前之襟抱修養，重新尋獲意義而有了「生」的力量，以對治病苦的折磨。

本文希冀透過治療學之精神，探勘使杜甫痛苦半生的疾病，所帶給他的積極力量，並藉此檢視杜甫一生所信仰的儒家思想，在他病後所開啟的治療意義，如何超越痛苦，展現人最光輝的內在。並由此自省當生命遇到極限狀態，平生所積累之學養修為是否亦能撐持自身，而向上開啟一個更寬廣的存在意義。

二、患病前：杜甫的人生任務課題

杜甫中年患病以前留存下來的詩歌數量雖然不多，然透過幾篇詩文可知其人生任務課題，並循此探討其衰病潦倒後，鼓盪於生命底層的汩汩動能。開元 29 年（741），杜甫在首陽山下寫了〈祭遠祖當陽君文〉，為他的人生立下深遠的責任：

[39]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雨〉，《杜詩詳注》（三），卷 19，頁 1671。

[40]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黃帝內經・靈樞・卷 6・師傳》，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3 冊，頁 368 上。

> 聖人之後，世食舊德，降及武庫，應乎虯精。恭聞淵深，罕得窺測，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緡甲江陵，祲清東吳，建侯於荊，邦於南土。河水活活，造舟為梁。洪濤莽氾，未始騰毒，《春秋》主解，膏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41]

「不敢忘本」之「本」就是遠祖杜預所樹立之允文允武、多才多能的治世勳業，是杜甫心中標準的儒家人物典範，《晉書・杜預傳》記載人稱其為：「杜武庫」[42]，因其文治武功，無一不能。「不敢違仁」即是從儒家怵惕惻隱「不忍人之心」所衍生之「不忍人之政」，而杜預任下興水利、富民安邦等裨益社稷之舉，就是「仁」落實在具體施政上的表現。從道德仁心到德政融通和合，就是杜甫的「本」，他從家庭傳統中正視了自己的天命（使命感）。

天寶元年（742），姑母卒，杜甫書〈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吾祖也，吾知也。遠自周室，迄於聖代，傳之以仁義禮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43]，孔子開出仁義禮，《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44]漢儒董仲舒於《賢良對策》中加入了「信」，云：「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45]，至於公侯伯子男，見《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46]，他們都是有爵位的輔弼之臣，杜甫藉以表示其家族身分之高貴，所指亦同天寶 13 年（755）進呈之〈進雕賦表〉：「奉儒守官，未墜素業」[47]，「奉儒」便是「仁義禮智信」，「守官」則是「公侯伯子男」，和合即是「素業」，以儒家仁義禮智信之核心修養、純正家風，擴充至以天下為己任的願志。是以，杜甫終其一身都懷抱著繼祖業，承天職，希冀「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誠如〈雕

41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祭遠祖當陽君文〉，《杜詩詳注》（三），卷 25，頁 2217。

42 唐・房玄齡等：《晉書・列傳第 4・杜預》（臺北：鼎文書局，1995），卷 34，頁 1028。載：「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也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43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杜詩詳註》（三），卷 25，頁 2229。

44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告子上〉，《孟子注疏》，頁 195 上。

45 漢・董仲舒：〈舉賢良對策〉，收入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23，頁 251 下。

46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卷 11，頁 1。

47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進雕賦表〉，《杜詩詳註》，卷 24，頁 2172。

賦〉所自比「以雄材為己任，橫殺氣而獨往」[48]的積極進取精神。

在尊儒的家風氛圍中成長，學習過程自是一絲不苟，天寶 6 年（747）之〈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追憶年少時挺出的才學與遠大的抱負：

>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49]

杜甫的學習過程就是其所認定「儒行」的培養與實踐，「觀國賓」出於《周易》〈觀卦〉：「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50]，意即杜甫從小就學習士大夫觀政事得失與民瘼的精神。另「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句，仇注載有三說：「一曰：『胸羅萬卷，故左右逢源而下筆有神』。二曰：『書破，猶韋編三絕之意。蓋熟讀則卷易磨也』。三曰：『識破萬卷之理』。」[51]此三「破」，皆指杜甫對自我才學的紮實培養，而奠定了堅實的學力，以致為文下筆有神，為學亦能識破諸理。綜觀此四句，杜甫自小就懷抱了極高遠的心志，並且孜孜不倦，以充實的學識作為堅實志向的基礎。經過「三破」的奠定，學習結果為「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自認賦能與揚雄匹敵，詩與曹植相近。漢以賦為主流，曹魏正是五言詩發展成熟時期，此二人之詩與賦皆為當代翹楚，而杜甫自謂能與其匹敵，可見對自我才能之信心滿滿。

接續成就與自信，青年杜甫也小有成就，獲得當時前輩的肯定，並與文壇重要人士交游往來，自云：「李邕求識面，王翰願為鄰」，另首詩〈壯遊〉也回憶了年少時受到的賞識：「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52]此刻志向才能與努力皆給予杜甫無比的信心，自負很快地就能立居顯要，論事朝堂。而立居要津只是實踐理想的第一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才是終極關懷，其心志與應璩所懷如出一轍：「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53]

---

48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雕賦〉，《杜詩詳註》（三），卷 24，頁 2173。

49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杜詩詳註》（一），卷 1，頁 73。

50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卷 3，頁 10。

51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一），卷 1，頁 74。

52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壯遊〉，《杜詩詳注》（二），卷 16，頁 1438。

53 魏・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收入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

杜甫以伊尹之賢臣名佐為願志，希冀在他的輔佐下，君王的德業遠過堯舜，社會和諧且風氣淳厚。足見杜甫之志皆繫乎聖賢事業，圖為君上分憂，淑世濟民。

如此家庭傳統與養成教育，造就了杜甫積極向上，承擔天下的儒者性格，天下有道時，儒者積極入世，天下無道時，更要展現儒者承擔天下的意志，此乃儒者之責任。前述之〈祭遠祖當陽君文〉與〈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皆為杜甫三十歲左右所寫，此時年輕的杜甫，尚未經歷生命的極限考驗，他將青春洋溢的靈魂，投注在大唐生氣勃勃的國勢上，聚合為一個沒有矛盾、充滿正向的人生任務。

然而，杜甫一生的轉折，從有道入無道，大抵在天寶 10 年（722）左右。天寶 14 年（756）十一月，安史之亂起，但於此之前，敏銳的杜甫已經嗅出帝國初腐的味道，且杜甫較早的疾病書寫，如前文所述，出現在天寶 9 年至 14 年間，世亂與疾病相乘的極限狀態，致使原本的人生任務課題不會再這麼和諧的存在胸臆間，他將面臨轉移、昇華或崩解，此刻根植於杜甫生命中的儒家精神節操，在苦難的激發下，必須要迎面承受，並融合其中的尖銳矛盾，以克服生命所面臨的危機，此時儒者承擔天下的天命，儒家意義治療學「我，就在這裡」的論式將更突顯於生命中，誠如余英時云：「儒家型的知識份子不只是坐而言的，他們同時也是起而行的。……以改變世界為基調，儒家型的知識份子在社會危機的時代總是要用他們的『道』來『撥亂反正』、來『綱紀世界』」。[54]

三、病後筋力削減所形成的意義困滯

理想的企及，往往需要強健的身體載乘，患病後身體狀態改變，是病者最真實的感受，病痛中的杜甫，感受到的是生命逐漸消逝，而恐懼天命不得完成的苦悶。上元 2 年（761），杜甫年屆半百，寫下〈百憂集行〉，敘述「十五」與「五十」間體

卷 30，頁 1218 下。

54 余英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臺北：允晨文化，2011），頁 98-99。

貌轉衰所牽動生命意義的困滯：

>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55]

「臥」是由長漸形衰老的形體表徵，是能動力以至於經濟力的減退，對所身處世界的掌握力亦逐漸消亡。因此，杜甫自認十五與五十最大的差異，是「坐臥」與「行立」下的體貌、行為，少年時期體魄強健，具有源源不絕之動能以攀上理想的頂峰，轉瞬五十即至，頹老身軀苦念生計且不可得，又遑論年少時所立之聖賢志業。

寶應元年（762），杜甫五十一歲，在病苦飄零之際，時而可見杜甫的喪氣話，〈客亭〉：「聖朝無棄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56]，自謂又老又病已不能供朝廷所用，且老病殘生中只餘細瑣之衣食奔走。

撐持著逐漸衰老的身軀，披星戴月赴早路，顛簸與不安適的生活，皆是加劇杜甫病痛的原因。另如〈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凌險澀。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汀洲稍疏散，風景開怏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57]

因貧病交纏而須依傍他人，難免有英雄氣短之愧，然而病老之際筋力削弱，又可奈何，思及此，便覺窮途無所適。「阮籍窮途」典出《晉書・阮籍傳》：「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之所窮，輒痛哭而返。」[58]以阮籍事表達身處窘境之悲傷。另「楊朱泣」典出《淮南子・說林》：「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59]指因誤入歧途而感傷。杜甫兼用兩事，流露出蒼茫風塵際，人間行路難的綿綿哀絕。

---

55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百憂集行〉，《杜詩詳注》（二），卷 10，頁 842。

56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客亭〉，《杜詩詳注》（二），卷 11，頁 932。

57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杜詩詳注》（二），卷 11，頁 955。

58 唐・房玄齡等：《晉書・列傳第 19・阮籍》，卷 49，頁 1361。

59 漢・劉安，漢・高誘注：《淮南子・卷 17・說林》，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 7 冊（臺北：世界書局，1978），頁 302。

病老筋力衰弱，無力憂世的疲弱感亦見於〈西閣曝日〉:「古來遭喪亂，聖賢盡蕭索。胡為將暮年，憂世心力弱。」[60]及至大歷 2 年（766），同、華二州，因盜據，民生凋殘，杜甫整副心思皆關注在「東北」亂事上，面對國變與疾病攻身，格外感受到昔日聖賢志業之落空：

> 四序嬰我懷，群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淒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塚。[61]

杜甫衰病辭官，故云不復周孔之夢。此典出於《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62]孔子一生周遊列國，宣揚理想，積極向上，而晚年面臨衰老，感受到命限將至，理想仍未實現的痛苦；杜甫借用孔子語，在命限之下面對天下大亂，有「傷亂不能救」之憂，而他所期待能救世匡亂之人，亦已歿世，故而，面對世亂之一籌莫展，昔日致君堯舜的理想遭受阻絕，致使其內心興起很大的矛盾。

生命的限度在這首詩中頻頻出現，古時胸懷天下之周孔，近時濟世救民之大臣，已各入枯塚，然而人生在任何艱困的境遇中，仍然有「抉擇的自由」[63]，如孔子所樹立之「君子憂道不憂貧」，這層生命的抉擇在杜甫心中已形成典範，當青年杜甫身強力健之時，典範只是美好高遠的理想目標，尚未有機會去成就這種偉大，而今「命運給了他一個類似的機會」，透過疾病降臨所強化的生命韌度，杜甫體會到自己「必須以同樣偉大的精神下決心和他周旋到底」[64]，因此年輕時以儒家為基底的生命任務課題，成為他人生最重要的出路（選擇），讓他決心以儒者迎接苦難承擔天下的情

60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西閣曝日〉,《杜詩詳注》(三)，卷 18，頁 1564。

61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晚登瀼上堂〉,《杜詩詳注》(三)，卷 18，頁 1620。

62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述而〉,《論語注疏》，頁 60 下。

63 傅朗克在《活出意義來》書中「抉擇與自由」一節，提到何謂「抉擇與自由」，即是「人處在這種（如集中營）情境下，根本上都可以憑他個人的意志和精神，來決定他要成為什麼樣子」。參〔奧〕維克多‧傅朗克著，趙可式、沈錦慧合譯:《活出意義來》，頁 88-89。

64 傅朗克在《活出意義來》中舉一罹患絕症者的例證:「他（絕症者）看過一部影片，裡頭有個人以勇敢和尊貴的方式等候死亡。當時，他覺得能那樣迎接死亡，實在是一大成就。如今——命運也給了他一個類似的機會。」參前揭書，頁 90。苦難往往提供一個讓生命學習與參照的機會，人得以選擇掌握機會以深化生命的意義。

感意境，深化生命的意義，並昇華為生命實踐的新一可能。杜甫將飢腸轆轆、貧困索食的個人小憂苦，化做憂心黎元的大悲苦；把「傷亂不能救」之矛盾，視為對自己的苛責，於是一肩挑起天下之艱難，頗具代表的是〈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聚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眼前何時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65]

這便是唐君毅所云：「把世界放在我以內看」[66]，林安梧釋云：「將此平坦攤開的世界收為一個擔子而承擔之、背負之」[67]，因浸潤於痛苦之中，原本個人之人生理想，昇華為解決自己與他人艱難之理想志願，而積極投入「公的事業」，於是形成意義治療學之簡易規條：「是，我在這裡」，挺出以自我為中心之根源與力量，誠如吳光明所言：「儒家充分接受『我』是一個指示性觀念的事實，……所有的改革和政治的和諧都根築於自我，並且由自我逐次開展」[68]，杜甫從「我」展開，開始他對這個苦難世界的理解、詮釋與承擔。以下本文欲從兩個角度論述杜甫如何以「儒家治療學」超越病苦的限制，找獲生命意義，而涵俱生生不絕的動能。

四、病後的意義治療與自我實踐

（一）返回夢想原鄉

疾病在現實層面，除了困滯了理想，也窒礙了詩人的形體，杜甫晚年將希望寄託在歸回家園上。其思鄉情結反映了理想落空的轉移，如果此身無法「立登要路津」，然若能在有生之年，返回故鄉，也是對自我天命的告慰。

至於杜甫故鄉為何處？杜甫祖籍襄陽，生於河南鞏縣，然《唐才子傳》記載

---

65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杜詩詳注》（二），卷 10，頁 832。

66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篇》，《唐君毅先生全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卷 3 之 1，頁 90-91。

67 林安梧：〈「是，我在這裡」：體驗的起點〉，《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頁 126。

68 吳光明：〈古代儒家思維方式試論——中國文化詮釋學的觀點〉，收入楊儒賓、黃俊傑編：《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96），頁 38-40。

杜甫是「京兆人」[69]，且杜甫本人於〈祭外祖祖母文〉中亦自稱「京兆杜甫」，於〈進封西嶽賦表〉:「臣本杜陵諸生也」[70]，屢稱之「京兆杜甫」，乃其郡望；杜甫遠祖杜預，《晉書》載其為「京兆杜陵人」[71]，而杜甫即是杜預幼子杜尹之後。在杜甫心中，有深遠感情的是郡望杜陵，以及情感厚密之出生成長築居之所洛陽。

杜陵屬長安，然此地除指其郡望外，在杜甫心中另有三項重大意義。其一，長安代表了唐代的盛世，也代表了杜甫的盛年，那個蒸蒸日上，承載希望的歲月，滋養了他「不敢忘祖，不敢違仁」之天命，因此長安亦是他精神上的故鄉。其二，過去的理想社會、昇平歲月對杜甫而言是極具意義的，它同為理想起點與終站，杜甫的希望從盛唐長安開始，而其亦為亂後所追索振興的美好國家圖景，故而長安更是他理想之故土。其三，在杜甫心中，遍地烽火造成關山阻隔，是歸鄉一大阻礙，如〈九日〉云:「干戈衰謝兩相催」，所以，他一向將對國家安定的渴求與返鄉的渴望契密融合，個人的返鄉便意味著國家歸返至理想的安定社會，亦是其個人願志之完成，而長安是帝京，帝京安則天下安，能平安歸返帝京，代表的是永恆的安定，這亦是杜甫終生所企求的。

是以，杜甫中晚年間雖流寓川蜀、江漢，然其未有一日不繫念返鄉之事，如其寓居成都草堂時，雖有過短暫安定的時光，但杜甫心中始終不曾將這種安定視為永恆，他早已決定最終一定要歸返故鄉，誠如其於〈奉送嚴公入朝十韻〉中所言:「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72]而杜甫所欲歸返的故鄉究竟是長安還是洛陽？

筆者以為，長安是帝京，是其理想之歸宿，精神上安邦安吾的歸返，這尤其在他許多纏綿病榻的詩作中可以看出。然而洛陽是其出生成長之所，年少時之聰質慧筆亦端賴洛陽山水的陶養，三十歲寒食節遙祭遠祖杜預，亦是於洛之首陽山，並築居於此，與夫人楊氏成婚，因此，返回洛陽，則是實質上人親土親的歸返。是以，杜甫所規劃的返鄉路線，可由廣德元年（763）書之〈聞軍官收河南河北〉中見其目

69 元・辛文房，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卷 2，頁 55。
70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進封西嶽賦表〉,《杜詩詳注》(三)，卷 24，頁 2158。
71 唐・房玄齡等:《晉書・列傳第 4・杜預》，卷 34，頁 1025。
72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奉送嚴公入朝十韻〉,《杜詩詳注》(二)，卷 11，頁 912。

的地確是洛陽：

>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73]

杜甫聽聞戰勝的消息，便覺歸家有日，喜極而泣，《杜臆》：「其喜在『還鄉』，而最妙處在束語直寫還鄉之路」[74]，兩河收復之後，他第一個念頭便是回鄉，規劃的路線是出峽，經湖北襄陽返回洛陽，本詩節奏明快，傾瀉而下，杜詩中極少見此欣喜若狂之作，足知杜甫之樂，起於天下之定，而其所憂，亦為天下喪亂。另見同年之作〈寄題江外草堂〉，此為杜甫避亂梓州，懷思草堂而作，同見其身體狀況與憂樂：

> 遭亂到蜀江，臥痾遣所便……。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75]

仇注解此詩十分透闢：「士大夫能視物我為一體，則無自私自利之懷。少陵傷茅屋之破，則思廣廈萬間，以庇寒士，念草堂則曰『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觸處皆仁心發露，稷契之徒也」[76]，此時徐知道亂蜀，杜甫避難梓州，雖有一方安身立命之所，然干戈一日未息，就一日無法泰適安身，可知君子常懷民胞物與之襟抱，仁心發露，視物我為一體，《論語・憲問》：「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77]，士之所嚮，非個人安居，而是發自生命底層的終極關懷，以及持續不懈的積極行動力。

因此，杜甫之憂縱橫交錯，橫的切面是滾盪在世亂中的飄泊滯留，而縱切面是疾病刻劃在身體上衰老的印記，逼出人生的有限性，而去壓迫出橫切面之欲歸不得的焦慮，若我們將這層焦慮層層撥開，就是「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的天下之憂，另如同在梓州所書之〈九日〉：

> 去年登高鄜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

73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聞軍官收河南河北〉，《杜詩詳注》（二），卷 11，頁 968。
74 明・王嗣奭：《杜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6），卷 5，頁 160。
75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寄題江外草堂〉，《杜詩詳注》（二），卷 12，頁 1014。
76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寄題江外草堂〉，《杜詩詳注》（二），卷 12，頁 1015-1016。
77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憲問〉，《論語注疏》，頁 123 上。

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78]

中間兩聯「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歲月流溢在天地間呈顯出的是「黃花無數新」，可是在體貌上卻刻劃出白髮催逼的痕跡，「今日重在涪江濱」的客居滯留，二度逢重九，讓他重新憶起世亂路難之根源——「嘆明皇荒遊無度，以致世亂路難也」，仇注此說，亦揭示杜甫在久客他鄉的深層憂懼中，著實牽連著對國事的擔憂。

永泰元年（765），杜甫五十四歲，此時已有頭風、腳足麻痺的病症，腎虛肺渴胃熱等臟腑之各種病變，逐漸侵害他的身體，慢性疾病消渴的不適症狀，也逐漸產生，長途的飄泊必然是不智的抉擇，日人小高修司論及杜甫累年病痛的外因，長途飄泊的生活確實加重了病況：「外因中特別有問題是『船上生活的繼續』。當然受到濕邪的侵襲，到了夏天之後，濕邪跟暑邪結合，冬天之後，它們跟寒邪纏在一起。」[79]此時杜甫宜滯留休養，然他仍舊以歸返家鄉為計，以饋慰對國家美好圖景的想望，而臨去成都前，寫了一首〈去蜀〉，云：「如何關山阻，轉作瀟湘遊」[80]，即使關山阻礙，長安難返，他都要拼搏一試，按照計畫，轉往荊楚，其中「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句之「白鷗」，前有鮑照〈還都道中作〉：「騰沙鬱黃霧，翻波揚白鷗」[81]，形容江浪騰攪如白鷗，仇注云：「萬事，憶從前。殘生，思後日」，昔日那個滿腔理想抱負的杜甫，已經是白髮病篤，思及往後，只能依託眼前滔滔江水，負載我歸回故鄉，話至此，蕭條淒冷，人生似無大志而云：「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實故作反語，想必已臨江灑淚，內心翻騰著對國家興衰的無限憂慮。

永泰元年五月，杜甫託身小舟，繼續返鄉之旅。大歷元年（766），杜甫滯留夔州，進入第二個深秋時節，在疾病衰老的催逼下，他對京城的思念愈為深切，〈秋興〉八首之一「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叢菊兩開」是時間流逝相對下之羈旅耽留，這是指無奈的現況；然而無論如何都不會改變的是，這一只孤舟，仍然

78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九日〉，《杜詩詳注》（二），卷 12，頁 1034。

79 〔日〕小高修司：〈杜甫疾病攷〉，頁 8。

80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去蜀〉，《杜詩詳注》（二），卷 13，頁 1217。

81 南朝宋・鮑照：〈還都道中作〉，收入梁・昭明太子，唐・李善注：《文選・詩（行旅下）》（臺北：華正書局，1995），卷 27，頁 384 上。

深深繫著我對故鄉的思念與歸返的希望。

>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其二）[82]

夕陽西隱，孤城更顯寂寥，天地間唯一的光點，便是北斗星所標誌的京城方向，那也是杜甫歸返的方向，「每依北斗」表示無數個夜晚，杜甫都憑著北斗尋定京城的方向，差不多同時的作品〈夜〉，也有相同的情感：「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步簷倚仗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83]，杜甫對故國的深情，往往能衝破形軀病殘的藩籬，他堅持著、堅忍著託身孤舟，往京城的方向駛去，即便因病滯留，也一定會追索故園的方向，不輕易鬆放。

接繼著「聽猿」句，三峽兩岸多猿猴，猿猴淒清的叫聲，將詩人從京華的想望中牽引回來，使得詩人驚覺此身仍處於孤城夔府，不禁潸然淚下，下句「虛隨」指得是本有機會隨嚴武而歸朝，可嘆最後仍是一場虛空，然而伏枕衰老的生命還能禁得起幾次落空？

尤其至大歷 2 年（767），除了本來的慢性疾患外，杜甫還患染「瘧癘」，這對衰弱的病體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 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寄薛三郎中璩〉[84]

瘧病本應是急症，《金匱要略》：「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為癒」[85]，此病源於風邪，在《內經・素問・瘧論》中有詳盡的介紹：「痎瘧皆生於風……得之夏傷於暑」[86]，而杜甫的瘧病卻反覆發作，如乾元 2 年（759），四十八歲時之〈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羈旅推賢聖，沈綿抵咎殃。三年猶瘧

---

82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秋興〉，《杜詩詳注》（二），卷 17，頁 1484-1491。

83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夜〉，《杜詩詳注》（二），卷 17，頁 1467。

84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寄薛三郎中璩〉，《杜詩詳注》（二），卷 18，頁 1621。

85 漢・張機，嘉興徐彬註：《金匱要略論註・卷 4・瘧病》，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734 冊，頁 36 下。

86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黃帝內經・素問卷 10・瘧論第 35》，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3 冊，頁 114-115。

疾，一鬼不銷亡。」[87]以及廣德 2 年（764），五十三歲時所作之〈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88]，直至前引之〈寄薛三郎中璩〉，至少長達八年，斷斷續續受瘧病所苦。

按照瘧病發病與季節關係密切的本質，照理說應發於夏秋兩季便止，而大歷 2 年（766）的瘧病，卻延續至冬春兩季，瘧病積久未癒的原因，於《諸病源候論・勞瘧候》中描述的很詳盡：

> 凡瘧積久不瘥者，則表裏俱虛，客邪未散，真氣不復，故疾雖暫間，小勞便發。[89]

杜甫此時已患有消渴，他的肝、腎、胃的功能是很衰弱的，必然難以順利生化固藏精氣，因此體氣虛衰亦可想而知；加上遠行勞役，瘧病更有復發的可能。當然還有風邪易趁體虛侵入，尤以杜甫舟行羈旅，傷於水寒，又遭風邪，致使瘧病反覆拖磨。而此時杜甫的病體感受，可由醫書所載瘧病的病狀推測，《內經・素問・瘧論》云：「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裂，渴欲冷飲」[90]，故推想杜甫此刻必然乍冷乍熱，頭痛欲裂，而其當下依舊計畫著東行，並於詩中鼓勵薛中璩:「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余病不能起」表達自身遭受極度不適的身體限制，在病苦的催逼之下，仍有一股對理想家國真誠摯愛的力量崛地而起，故其所思所想亦以恢弘天命為旨歸，顯現出無窮的精神意志。

因病篤沉綿，在往後歸鄉的旅途中，杜甫時而受阻於病體，影響歸程，如〈敬寄族弟唐十八使〉:「歸朝跼病肺，敘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旬」。[91]及大歷 3 年（768），病體日漸沉重，在〈送覃二判官〉詩中以「蹉跎」與「不復」表達

---

87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杜詩詳注》(一)，卷 8，頁 641。

88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杜詩詳注》(二)，卷 14，頁 1192。

89 隋・巢元方:《諸病源侯論・總論卷 11・勞瘧侯》，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4 冊，頁 642 下。

90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黃帝內經・素問卷 10・瘧論第 35》，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3 冊，頁 114。

91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敬寄族弟唐十八使〉,《杜詩詳注》(三)，卷 21，頁 1865。

疾病阻絕了一切可能：

> 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荊衡。……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92]

病苦逼出了杜甫的矛盾與迷離，「蹉跎」與「不復」是多麼決絕，而「永懷」、「戀」、「亦上」又說得這麼肯定，身體感受到的是筋力衰減而不得歸往，可是返鄉之願志卻如此生生不息。然而不幸地，杜甫返鄉之志最後也落空了，大歷 5 年（770），杜甫避臧玠之亂入衡州，作〈逃難〉一詩：

> 五十頭白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93]

此詩可謂其「孤舟一繫故園心」願志之沈痛總結。杜甫逃難之起算日，由「五十頭白翁」入蜀避難始，「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是杜甫自陳南北奔波逃難之艱苦實況，接繼著「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杜甫從自身的衰病擴大至整個大唐王朝的沒落，聚合為一無處可依的荒蕪與落空，尾聯「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心痛不已，這不僅僅是一次大規模的逃難，更是黎民百姓從幸福時空中的徹底拋離，杜甫終其一生，唐朝終其一世，都不能再度返回幸福安定的夢想原鄉。

杜甫所遇到的是國家與個人的雙重病苦，他不斷以積極入世的行動力，克服各種病苦，返鄉便是天命理想的另一層落實，若能突破各種關卡而重歸故里，也象徵了國家重建一安穩之整體秩序。意義治療之精髓即在於痛苦矛盾中仍能發掘理想與價值，並追索存在的意義，而此意義並非自我表現與欲足，而是體貼天命，以他自認為儒者之綱紀世界與承擔危難之使命，落實為仰望京華、輾轉奔赴，以答覆生命的詢問，也因此，生命才擁有充盈的力量。杜甫以其病弱之身，欲返鄉而輾轉川蜀、江漢十餘年，直至潭岳，才不敵病魔命運侵凌而告終，這已是杜甫一項重大的生命

92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送覃二判官〉，《杜詩詳注》（三），卷 22，頁 1933。

93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逃難〉，《杜詩詳注》（三），卷 23，頁 2073。

成就。然而在歸鄉之途頻頻受阻的極限狀態下，他又何以再次超克痛苦，以回應生命之艱難，乃為本文第二部分所欲論述者。

（二）承擔艱難與克服艱難

積極返鄉只是杜甫在受苦過程中欲履踐之生命意義，他透過這樣循循不絕以追尋來日的希望，而得到慰解。可是，如果以「行動」進行治療，一定有無法企及的風險，如杜甫晚年也體認到「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的絕境，最終且客死他鄉，誠如傅朗克所提出，當病人遇到再也無法創造價值與體驗經驗的狀態下，那他的生命才真正獲得昇華的「機會」，所以，當自己發現，滿目瘡痍的病軀已無法「成就一種創造」，以「建設性的工作來賦予生活意義」[94]，以杜甫的話來說，就是「以雄材為己任，橫殺氣而獨往」的可能已步步喪失，甚至病體亦不足以撐持其返鄉的願志，任何透過形體治癒才能完成的治療途徑已經不存在了，此時病者始有機會攀升至自我治療的終極層次，內在日益淨化、增上、擴充，而不需資藉行動之獲抵目標而完成治療。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人類超越物質、心理而有更高層次的精神展現。

而在人生歷程中的許多極限狀況下，儒家思想一向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來回應生命的艱難，此謂孔子之「義」、「命」分判，挺立人之「自覺主宰」[95]，如果我們正面肯定人之責任與使命，突出「應行」而不計成敗得失命限，就會重新尋獲生命的積極意義，而病痛便得到了內在的調節與疏通。這也是儒家的任務課題與傅朗克意義治療學所揭示的任務不盡相同處，唐君毅云：「人在堅忍中，以有德而能受苦，能受苦即見其德性」，因此，透過生命的極限狀態，我們能看到成長不休且不斷深化的精神層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杜甫病後所呈顯的精神世界，將會發現杜甫的終身之憂，還是交纏在國家社稷上。自患病前就將「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視為天命，所以不斷擔憂的是理想實踐與否的問題，而非個人疾病治癒與否，即使滾盪在疾病中的飄

94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與心靈對話的意義治療學》（臺北：遠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頁 8。

95 關於孔子「義命分立」，「應然」與「必然」之區別，引自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頁 136-143。

泊墮深了生命的落空，將希望寄予歸返，而竟不可得，我們依舊能看到杜甫對理想生生不息的投入，以惻隱之仁忍受艱難、乘載艱難、克服艱難，此為杜甫治療之終極意義。可由〈別蔡十四著作〉見其志：

> 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睹耕桑民。[96]

此段引詩中，有兩組「義」與「命」之對比，一組乃個人的衰老不遇與整個國家的安定對比起來，渺小微不足道；一組乃「尚思未朽骨，復睹耕桑民」，再次對比個人命逝與國泰民安，表示形軀枯朽實不足道，之所以期待「未朽骨」，只為能目睹百姓們過著男耕女桑的安定生活。[97]

其中「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句，呈現了消渴病甚之際，杜甫懷抱的仍是家國之憂，並以此禦病痛之患，從一己之私的欲望中昇華，形成一種胸襟與勇氣，抵消了患病的痛苦，於是就有了「尚思未朽骨，復睹耕桑民」的仁者胸懷。所以即使病體衰弱，他的生命中依然存在著各種對理想實踐的可能念想，另如同年所寫之〈客居〉，亦可見其生命常處於「自強不息」的恆動中。

〈客居〉詩中按杜甫自陳，已臥病在床多日，稍有起色便「徐步視小園」，且又從小園追想故國，而興躊躇滿志：「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98]，此時雖於病痛之中，體氣衰弱，卻有充實於天地間的內在造化之源，故而流洩著沛然豐潤之生命泉源，也才能寫出欲傾八海之水，洗盡天地風塵，使之清明之豪語，以及自己可如稷契一般，輔佐朝政，不使犬戎來犯之壯語。而此源源不絕之內在動能，即是君子「將全副生命迴向整個生活世界」[99]之「仁心成德」，落實在詩中現實義便是「臣子憂四藩」之對國家的一體承擔與終身憂勞，因此雖以「儒生老無成」表達了現實世界的

---

96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別蔡十四著作〉，《杜詩詳注》（二），卷 14，頁 1259。

97 對民瘼的關注，一直是杜甫在政事上最在意之事，在許多以送行為主題的詩歌裡都顯示出來，如〈送陵州路使君之任〉：「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牽繫的是大亂之後，民生凋敝，人民貧困。見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送陵州路使君之任〉，《杜詩詳注》（二），卷 12，頁 1032。

98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客居〉，《杜詩詳注》（二），卷 14，頁 1254-1255。

99 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頁 37。

落空，可是精神世界仍然生機無限。

另如大歷元年（766）夔州所作之〈客堂〉：

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來，衰年得無足。[100]

自敘因病久客，隨著年紀老邁，已是沉綿病榻，不良於行了，但仍心念著故國，就如同「老馬南雁」般又老又病，欲歸卻「慚筋力」。詩的開首哀傷病痛，陳述自身筋力衰弱的窘況，而詩的結尾又振起心中最真誠的想望：

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101]

仇注云：「今廟堂正直，欲還京以圖裨益，其如形骸衰罷何。進退兩難，徒委之行色而已」[102]，而今廟堂正直，正是謀劃裨益的好時機，所以他說「毫髮裨社稷」。此刻回視自身，發覺已是年邁多病，然而，即便只剩下一口氣，都願意裨益國家，這是出自對國家死而後已的深情，情到深處，又歸回病體感受，可是當下的身體狀態，恐怕連進退都不能自主。杜甫偶爾會陷入這樣（病老／理想）的身心困境中，尤其當病苦一直侵襲著身體的時候，如在〈贈鄭十八賁〉詩中，杜甫自述：「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杜詩鏡銓》解云：「此言以病暫駐行蹤也」[103]，可見此時杜甫病痛之甚，所以說「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104]，認為自己逐漸惡化的疾病，恐難以支撐遠大的志向了，無法用世列位朝班，所以說「力與願矛盾」。

然而，即使願志理想與病軀現實形成矛盾，但是杜甫從未躲開這層矛盾，而以自願忍受並背負痛苦的模式，勉力消解之。如見大歷元年（766）秋天，杜甫行遊夔州先主廟，謁廟之感：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熟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惟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

100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客堂〉，《杜詩詳注》（二），卷 15，頁 1268。
101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客堂〉，《杜詩詳注》（二），卷 15，頁 1269。
102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客堂〉，《杜詩詳注》（二），卷 15，頁 1269。
103 唐・杜甫，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里仁書局，1981），卷 12，頁 587。
104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贈鄭十八賁〉，《杜詩詳注》（二），卷 14，頁 1258。

寂寞灑衣襟。[105]

「搖落」有雙義，一是秋色搖落，一是人體如秋天般衰弱，即是杜甫當時的體貌，尤其在天下離亂動盪之際，人飄泊於天地間更易衰謝，所以就無法如三國時期蜀國關張一般，君臣相謀，為中興名佐，救世濟苦。由此可知，杜甫之憂乃為國，而非為家、為個人，可是人已遲暮，又何能歸朝為君上分憂，現在似乎只能做個煙波釣叟，思及此，「向來」二句表達了他由始至終，持守不移的憂國之志，都只能虛化成點點淚水，因此以下接續「寂寞」二字，訴盡了矢志行道的過程中，面對矛盾襲來（憂國願志與現實命限），也同時願意承擔道之不行的寂寞，此亦為仁人君子、能人烈士苦其心志之重大試煉。

承上，由於疾病侵擾，杜甫時而懷疑自己對國家承擔的可能（任務願志達成之可能性），也會痛心於道之不行，但是他從未懷疑過自己上承天命所砌築的精神高牆，即便可能毫無希望，仍然努力實踐生命的意義，因此，屢見於杜詩中的，還是矢志不移對國家的承擔與投入，亦如於秋日夔府所書之〈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106]

仇注云此四句為「舊臣憂國之懷」，杜甫追想著年少之理想壯志，而眼見鏡中映射的老邁衰容，一生蹉跎即逝；「行藏」語出《論語・述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107]，而今老病纏身，我杜甫究竟欲歸朝欲退隱，令他終夜不能寐，倚樓獨思，誠如仇注所云：「看顏色而計行藏」，杜甫時而陷入此種矛盾中，卻又旋即衝破迷離，呼引出最終極的答案：「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這便有「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108]，孟子不憂不懼之精神，奔赴並成就天下蒼生之共同福祉之願志，成為生命篤健之動能，而形軀之衰限便已不在此計量之中了。

由是，患病使杜甫生命中產生衝突與迷離，疾病困滯了他的「創造價值」，然而

105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謁先主廟〉，《杜詩詳注》（二），卷 15，頁 1355。
106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江上〉，《杜詩詳注》（二），卷 15，頁 1329。
107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述而〉，《論語注疏》，頁 61 上。
108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公孫丑下〉，《孟子注疏》，頁 85 上。

一種自強不息的道德使命又帶著他飛昇，尤其當生命進入極端極限狀態時，「態度價值」便展現了，傅朗克說：「態度價值的實現，唯有那份苦難是在現實環境中所無法逃避的時，才可能獲致」[109]，並且最後能「坦然無畏的面對命運，以實踐價值的態度，可說是人被所授予及認肯的最高成就」[110]，挺立主體精神，不斷為此理想獻身，如同找到生命實踐的動能，恰如〈倦夜〉詩，詩中描寫的流螢同為自身寫照：「暗飛螢自照」[111]，晉傅咸有〈螢火賦〉：「雖無補於日月，期自照於陋形」[112]，杜甫為「萬事干戈」而終宵不寐，見螢火微光雖無補於日月，卻仍在暗夜中獨自飛舞。

他從飛螢中看到了自己，而我們透過這首詩將杜甫橫向縱向都剖白了，「空悲清夜徂」按仇注云：「初秋夜短，故歎其易徂」，唯有夜晚，才能將螢火的積極美好襯托出來，又可惜初秋夜短，白日一來，螢火便消逝了，在有限的時間中仍存有實踐價值的態度，正是杜甫的精神，形體生命賦予他成就事業的基本可能，但形體同時也展示了隨時消亡的必然，因為見到「空悲清夜徂」的有限性，無所遁逃於病苦的消磨，才足以突顯「暗飛螢自照」奮力積極。

除了飛螢外，「仗劍」也是杜甫用以表達這種奮鬥精神的符碼，〈夔府書懷四十韻〉之「拔劍撥年衰」，展現出力透紙背的慷慨激昂，又如寫於大歷 2 年（766）之〈又上後園山腳〉：

> 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113]

據《杜詩鏡銓》引劉須溪語曰：「本上後園山腳耳，卻從昔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故收拾悲慟」[114]，杜甫一向心繫家國，登高遠眺中原，追憶天寶 9 年朝廷窮兵黷武，百姓受戍役所苦，無力於農事，俯及今下，同樣中原憔悴，世

109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與心靈對話的意義治療學》，頁 9。

110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與心靈對話的意義治療學》，頁 8。

111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倦夜〉，《杜詩詳注》（二），卷 14，頁 1176。

112 晉・傅咸：〈螢火賦〉，收入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 51，頁 12。

113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又上後園山腳〉，《杜詩詳注》（三），卷 19，頁 1661。

114 唐・杜甫，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頁 776。

亂難歸，不禁悲從中來：

> 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復見，況乃懷舊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115]

杜甫望見烽煙遍地百姓疾苦，此時內心已十分激動，由於肺燥耗津，咳嗽不止致身體顫抖，也因為消渴之故，身形消瘦，然而他內心對世亂、難歸的擔憂仍衝破了形軀萎頓，慷慨之餘，持拿劍匣，登上高岡，以仗劍來表達負荷天下之行動力，即便「蕩析川無梁」呈現無路可走的事實，然而並不影響其當仁不讓之決心。

另首〈雨〉：「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相路」，即便有伏枕之危，也能克服形軀之苦痛，乘平肩輿而行之，可是問題卻糾結在「莫辨望鄉路」，因為「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兵戎阻斷了歸鄉路，致使他只能繼續流離，雖然人生處於不得不流落孤域的境地，但是杜甫從未放棄希望，永遠保持那份迎面而來的積極精神。

大歷 3 年（768），杜甫除了痼疾，還有眼疾與耳聾。一個腎氣不足，脾胃有虧而飽受消渴病大渴與多飢折磨的病人，加以肺咳而無法安臥，眼睛昏茫且一耳失聰，身形消瘦見骨，如此病頹至極，仍有氣吞萬里的情懷：

> 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創。時清疑武略，世亂跼文場。餘力浮於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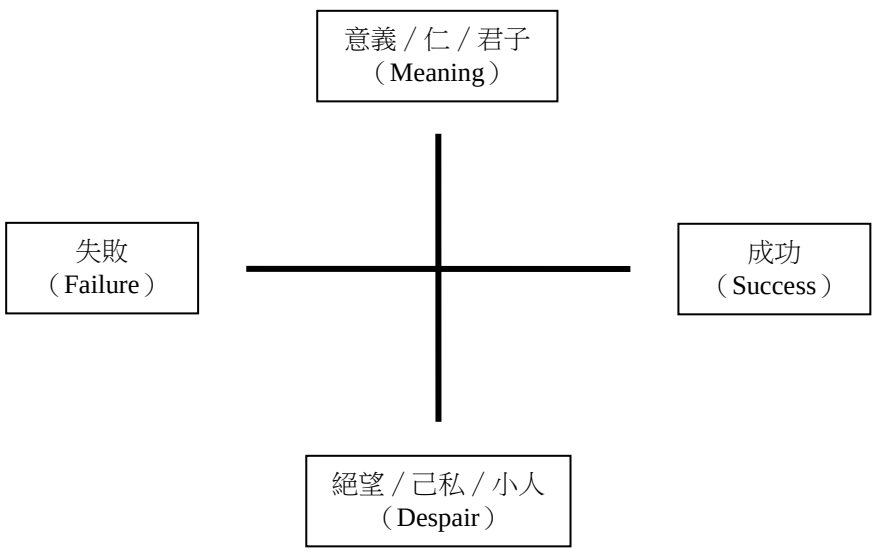
以「劍匣」、「錐囊」流露出杜甫壯志不滅，最末兩聯表達任何事情都能忘懷得失，唯有故國無法忘棄，可見杜甫源源不絕的生存意志，實是來自對故國的牽繫與懷想，尤在顛沛流離之中，失意病苦之下，仍然矢志不移自強不息，便能突破一切苦難。傅朗克說：「我們一旦突破了受難，那麼在成功與失敗的垂直面上，上下於意義與絕望的兩極之間」，「而人之自由，就在如何選取個人的立場」[117]，我們可以選擇透過病苦而發現生命的意義，昇轉出精神世界之生命實踐，也能選擇徹底的絕望與沈淪，轉沉於挫敗沮喪中。如果選擇破除成功與失敗（命限問題），生命便為一「層層向上

115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又上後園山腳〉，《杜詩詳註》（三），卷 19，頁 1662。
116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遣悶〉，《杜詩詳注》（三），卷 21，頁 1898。
117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黃宗仁譯：《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頁 29。

的立體世界，就是仁」[118]，亦即唐君毅〈病裡乾坤〉所云：

> 此出自吾一己之私之煩惱之減輕，乃始于吾父之逝世，而吾自知對吾母及妹弟之有責。吾由此而知一切人皆惟賴其具體之行事上，自為其義之所當為者，乃能自拔於個人之孤獨以外，否則人雖存希聖希賢之念、悲天憫人之懷，而不能自絕其一念反緣而生之自命不凡之傲慢，則人終為小人之歸。[119]

這才是真正的治療，從「一己之私之煩惱」超拔出來，重新體悟到生命「自為其義之所當為」的境界。如果我們將傅朗克與唐君毅之「儒家意義治療學」做連結，在傅朗克意義／絕望、成功／失敗的圖示上重新加工[120]，顯示「是，我在這裡」的立體世界，如下圖所示：



我們一般人遇到生命的極限狀態時，總會執究於成功／失敗與否的創造價值意義之上，可是當病痛纏身之際，創造價值必然最早喪失，於此，若陷溺於一己之私的小人心緒中，生命便會痛苦絕望，然而，若能以一巨大之心量，消融了人生之有限性，於是便能從一己之成功／失敗的二元對立中超拔而出，日益增上淨化進而啟

118 徐復觀：「人格內在世界，是質的世界，是層層向上的立體世界。此一人格的內在世界，可用『仁』字作代表」。參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73。

119 唐君毅：《病裡乾坤》（臺北：鵝湖月刊雜誌社，1980），頁 12。

120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黃宗仁譯：《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頁 29。

開生命的動能，這便是仁人君子之自我治療層次，即唐先生所謂「層層向上的立體世界」。再以大歷 2 年（766）於夔州所作〈同元使君春陵行〉為證：

>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獄訟永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飆振南岳，之子寵若驚。色阻金印大，興含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澹字敧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121]

詩的開首，就把世亂在詩人形體上刻劃的痕跡給重重的描寫出來：「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世亂迫使詩人白髮皤皤，老病沉綿，「沉綿」是指病甚，「盜賊際」是世亂，沉綿於亂世之中，所以才會「狼狽江漢行」，陷入進退不得的困局。「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句承老病言之，徒有醫病之藥，卻無法治療內心因憂國而鬱結，故而藥力不顯，足見在病苦滯留之際，內心所繫仍然是國變，亦可知杜甫從未以形軀之治癒為終極意義。詩至最末「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我多長卿病」之以「多」表達伏枕之危，可是我仍然「日夕」思朝廷，以「日夕」呈現與病痛同歲共生的家國承擔。

在此詩中言「歎時藥力薄」，與稍晚所作之〈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中「藥餌虛狼籍，秋風灑靜便」[122]，均以「薄」與「虛」表達藥石無效，為何無效，因回歸故國的心願與兵戎阻隔的事實相違，思君用世之情與貧病老儒之實相違，世界中之成敗是非造就了許多矛盾，但是杜甫沒有逃避，他選擇以一巨大之心量去融通這些矛盾，所以在詩中，常見其勇於承擔的心志：「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邅。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其中「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邅」其情悲壯至極，他將國家的矛盾衝突皆納入自己的矛

121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同元使君春陵行〉，《杜詩詳注》（三），卷 19，頁 1691。

122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杜詩詳注》（三），卷 19，頁 1707。

盾中，以自己孱弱的身軀去承擔國家的離亂。

大歷 3 年（768），杜甫忍著病痛，舟行出峽，有詩〈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 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灩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懶計卻區區。……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俶擾，鶉首罷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迴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林託疲苶，未必免崎嶇。[123]

此可見杜甫對己之自信，與自負用世之心，他一方面肯定救房琯事之應行、當行，一方面感嘆世亂之際，武將當道，儒官雖懷濟世之才，惜乎不為朝廷所用。接著，他從自己不遇的小心量，轉入整體國家憂時救弊的大心量，儒官不受重用，朝中無伊呂大臣，致悍將難馭，以故烽煙四起而生民罷敝，而我杜甫也是這生民百姓中之一員，遭逢世亂，無力可解，亦陷溺其中，只得拖著衰弱病老的身軀，繼續忍受無止境之漂泊。

杜甫長吁不樂之故，往往糾結在「公之志業」無法施展的問題上，但是強烈的「應行」、「當行」的驅動，即使在肉體上飽嘗病苦，但是他在精神上對疾病的痛苦感受不深，在人「應行」之道上，挺出了人之主宰性。如〈柳司馬至〉詩中云：「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124]當時柳司馬至夔，杜甫問及兩京近況，對方訴說吐蕃入寇之事，此時杜甫自陳雖疾病纏繞，身體是衰謝的、蕭條的，而戀主之心卻皎如霜天，千里明淨。此般一往情深的掛懷，就是他捐軀濟難之自願承擔而不可得之下，流洩而出的款款深情。

杜甫逝於大歷 5 年（770），前一年於潭州所做之〈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

123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杜詩詳註》（三），卷 21，頁 1870。

124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柳司馬至〉，《杜詩詳註》（三），卷 21，頁 1824。

路思捐軀」[125]，即便沉痾難愈，他仍心念著道之行與不行，「此生已愧」表示早年致君堯舜的心願都落空了，「思捐軀」典出曹植〈求自試表〉：「憂國忘家，捐軀濟難」[126]，此刻他的病軀早已枯朽，仍願捐軀以赴公家難，並以此積極進取之態度交勉裴、蘇二人。此交託承擔天下之責，亦是杜甫面對形枯病朽，失意落寞的極限狀態下，對理想價值積極持守的表現，如〈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 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為困衣食，顏色少稱遂。……子干東諸侯，勸勉防縱恣。邦以民為本，魚飢費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列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127]

杜甫一直持守著愛民懇切之心，語中有為民請命，也有對友之激勉，其中「請哀瘡痍深」即是怵惕惻隱已發之道德本心，向外所弘顯的對國家社會之使命，同時，杜甫也誠懇的期待朋友們也有同樣道德自覺的能動力——「列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自致」即一反躬自省之道德覺醒，賢者當端持以恆，依此道德本心實踐，收束天下一肩負之，救治家國根源上的頹敗。

同樣的期待也投注在韋諷身上：

>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今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128]

其中「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必若」二字，充滿了肯定與請求，蕭滌非云：「亦無可奈何中做此痛哭流涕之論耳」[129]，杜甫無法實踐之事，只能深深請託韋諷。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對韋諷深負期待，一方面是他「貴為德」，清節正直，而這也

---

125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杜詩詳註》（三），卷 23，頁 2019。

126 魏・曹植：〈求自試表〉，《曹子建集》（臺北：中華書局，1970），卷 8，頁 5。

127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杜詩詳注》（三），卷 22，頁 1926-1927。

128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杜詩詳註》（二），卷 13，頁 1156。

129 蕭滌非：《杜甫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 193。

是杜甫本具之德性，一方面是他「富春秋」，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與無限可能，這是「伶俜臥疾頻」的詩人所無法企及的。另如〈寄薛三郎中璩〉:「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雖然自己衰病無以濟世，然對於國事生民的擔憂仍不止息，而寄託在筋力、才思均雄健的薛璩身上。

由此可見，杜甫有當仁不讓、以道自任的胸懷，同時也有「超越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130]，在此襟抱之下，對己之病苦與失意雖有悲歎，但那只是詩人憂愁幽思之感發而已，其心所持者，唯承擔「公之志業」，而此正是杜甫病後治療之終極意義，因為有與疾病同歲之家國承擔，以積極向上自強不息之願志，充盈其內在本源，才能涵融病苦帶來的俗情世間之得失苦痛，由自己起始去成就生命的圓滿。

五、結論

杜甫患病前的人生任務課題，以聖賢事業為志，淑世濟民為本。年輕且體魄強健的杜甫，將青春昂揚的靈魂，投注在大唐生氣勃勃的國勢上，聚合為一個沒有矛盾、充滿正向的人生課題。然而，患病之後，杜甫首先遇到的生命極限問題，疾病造成的筋力衰弱，無以支持盛年之志，形成生命意義的困滯與理想實踐的矛盾。

因此，杜甫第一步所要融通的是體貌衰減所牽扯的意義困滯，而在這痛苦之際，以儒家為基底的生命任務課題，成為豐潤其「生」之動能。是故，杜甫將貧困索食的個人小憂苦，化做憂心黎元的大悲苦；把「傷亂不能救」之矛盾，視為對自己的苛責，於是挺出以自我為中心之精神意志，一肩挑起天下之艱難。而其病後之意義治療則具體落實在兩個部分，其一為返回夢想原鄉，杜甫晚年將希望寄託在歸回家園上，其思鄉情結反映了理想落空的轉移，而故鄉又表徵著昔日美好安定歲月，因此，奔赴故鄉是杜甫重尋生命意義的重要旅程。

130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 39。

如果將希望寄予歸返，而竟不可得，生命又墮入更劇烈的極限狀態，杜甫必須再超克痛苦，以回應生命之艱難。因此，本文後半部揭示了杜甫病後治療之終極意義，其從一己之私的欲望中昇華，當仁不讓奔赴並成就天下蒼生之共同福祉，於是形成一種胸襟與勇氣，將形軀之疾治癒與否逼出意義之外，挺出人之自覺主宰，開啟自我實踐的動能。

儒家治療學若操作實踐起來，境界何其高，取決於病者豐富的精神世界與修養，必然有其困難度。而杜甫的中晚年詩歌，其旨雖不離「年老多病」、「感時思歸」[131]，然其堪稱「儒家意義治療學」之典範，非在於思鄉嘆病之自我抒懷，而是在此身心艱難的經歷中，向世人展示：「我如何進入生命的精神層次中思考」，以一巨大心量，不斷超越自我，消融疾病帶來的痛苦與不便，此亦是杜甫晚期詩歌驚心動魄之處。同時提供我們探尋人們在疾病受苦過程中產生的啟發作用與奮鬥歷程，如此亦能彰顯疾病書寫的價值：人在無可逃避的痛苦中，那股追尋生命意義的積極力量。

131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返照〉，《杜詩詳注》（二），頁 1337。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漢・張機，清・徐彬註：《金匱要略論註》，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

漢・劉安，漢・高誘注：《淮南子》，收入《新編諸子集成》第 7 冊，臺北：世界書局，1978。

漢・劉熙：《釋名》，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臺北：商務印書館，1966。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

魏・曹植：《曹子建集》，臺北：中華書局，1970。

梁・昭明太子，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5。

隋・巢元方：《諸病源侯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4 冊。

唐・王冰次注，宋・林億等校正：《黃帝內經》，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3 冊。

唐・王燾：《外臺祕要方》，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736 冊。

＊唐・杜甫，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78。

唐・杜甫，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里仁書局，1981。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94。

元・辛文房，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明・王嗣奭：《杜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6。

清・不詳：《原本廣韻》，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第 224 冊。

清・浦起龍：《讀杜心解》，臺北：中華書局，1988。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2009。

二、近人論著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余英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臺北：允晨文化，2011。

吳光明：〈古代儒家思維方式試論——中國文化詮釋學的觀點〉，收入楊儒賓、黃俊傑：《中國古代思維方式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96，頁 35-84。

＊林安梧：《中國宗教與意義治療》，臺北：文海學術思想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1996。

林安梧：《新道家與治療學——老子的智慧》，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唐君毅：《病裡乾坤》，臺北：鵝湖月刊雜誌社，1980。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篇》，《唐君毅先生全集》三之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傅偉勳：《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

＊傅偉勳：《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臺北：正中書局，2010。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1995。

蕭滌非：《杜甫詩選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日〕小高修司：〈杜甫疾病攷〉，《中唐文學會報》16（2009），頁 1-29。

〔日〕小高修司：〈杜甫と白居易の病態比較－特に白居易の服石の検証－〉，《白居易研究年報》11（2010），頁 258-276。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游恆山譯：《生存的理由——與心靈對話的意義治療學》，臺北：遠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黃宗仁譯：《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臺北：杏文出版社，1993。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趙可式、沈錦慧合譯：《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臺北：光啟文化，1995。

＊〔奧〕維克多・傅朗克著，鄭納無譯：《意義的呼喚》，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200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Du Fu (Tang Dynasty). Qiu Zhao-ao, note. *Du Shi Xiang Zhu* (Detailed annotation of Du Fu's Poem). Taipei: Le Jin Books Ltd, 1978.

Fu Wei-hsun. *Pi Pan De Ji Cheng Yu Chuang Zao De Fa Zhan* (Critical Inheritance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Taipei: Dong Da Book Co. Ltd., 1986.

Fu Wei-hsun. *Si Wang De Zun Yan Yu Sheng Ming De Zun Yan* (Dignity of Death and Respect for Life). Taipei: Cheng Chung Book, 2010.

Hsu Fu-kuan. *Zhong Guo Ren Xing Lun Shi*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The Pre-Chin Period).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69.

Lin An-wu. *Zhong Guo Zong Jiao Yu Yi Yi Zhi Liao* (Chinese religion and Logo therapy). Taipei: Wen Hai Xue Shu Si Xiang Yan Jiu Fa Zhan Wen Jiao Ji Jin Hui (Wen Hai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1996.

Tang Jun-yi. *Bing Li Qian Kun* (Universe in illness). Taipei: Legein Monthly, 1980.

Viktor E. Frankl. *The Doctor and the Soul*. (You Heng-Shan, trans.).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1991.

Viktor E. Frankl. *Man's Search of Meaning*. (Chao Ke-she, Shen Chin-huei, trans.). Taipei: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1995.

Viktor E. Frankl. *Was nicht in meinen Buchernsteht: Lebenserinnerungen*. (Zheng Na-wu, trans.). Taipei: Psy Gard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Xiao Gao Xiu Si (Japan). "*Du Fu Ji Bing Kao*" (The Study of Du Fu's Illness). *Journal of Middle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16(2009): 1-29.